



罂粟。

由救命之药到夺命之毒 <<<



● 苏智良

罂粟是阿拉伯使者带给大唐的礼物,在进入中国的最初几百年里,罂粟是悦目的观赏植物和救命的治病良药,而后却演变为谋财害命的毒品。

阿拉伯使者带来的礼物

罂粟原产于西亚阿拉伯半岛、南亚印度等地。中国并不是罂粟的原产地,罂粟及其制品的鸦片都是从外国传入的。

罂粟及其制品的传入,始于唐代。《旧唐书》列传载:“乾封二年(公元667年)拂菻遣使献底也伽。”经德国学者夏德(Friedrich)等的研究,“拂菻”就是大秦,即东罗马帝国,其中心位置约在今叙利亚。拂菻那时已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个省。

“底也伽”,古音为 **te ya ka**,是当时西方的珍贵药品。据阿拉伯史家称,上等的“底也伽”产自伊拉克的巴格达。自古西方就认为,“底也伽”是疗效最佳的解毒药,它由600种物质混制而成,这种丸状药的作用可解除一切中毒。“底也伽”的主要成分是:鸦片、龙涎香、缩砂、肉豆蔻、肉桂等,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鸦片。

从这些史料中基本可以推论,鸦片是古阿拉伯人传入中国的。

唐代时,正在急速扩展中的阿拉伯帝国,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,阿拉伯向中国派遣正式使者就有37次。从古阿拉伯进入中国,主要有陆海两条路。陆路由丝绸之路进入长安,海路则是经马六甲海峡到达广州、泉州、扬州等地。成书于10世纪上半叶的不朽名著《一千零一夜》,也反映了西亚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。这种交流的规模即使是在交通十分发达的今天看来,也令人叹为观止。那时在长安、广州、泉州等地经商的

阿拉伯人不下万人。阿拉伯人带来了象牙、棉花、白糖、宝铁等特产,也带来了罂粟和鸦片。

从文献记载考证,乾封二年阿拉伯使者贡献“底也伽”,是鸦片进入中国之最早记录。但中国人对鸦片的认识却要早于这一文献记载。成书于高宗显庆四年(公元659年)的《唐本草》有“底也伽”一条,载:底也伽,味辛苦,平,无毒。主百病,中恶,客忤邪气,心腹积聚,出西戎。这本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的成书,比史载的阿拉伯人献“底也伽”还要早8年,而且明确地记载了它的药用效果。因此,我们有理由推断:在公元7世纪的上半叶,唐初,底也伽——也就是鸦片——已进入中国了。

阿拉伯人在贡献“底也伽”的同时,也将罂粟送到了中国。

美丽的药物

不久中国人就开始种植罂粟。由于罂粟花异常娇艳,唐代人多将它作为观赏植物。诗人雍陶在《西归出斜谷》中写到:“行过险栈出褒斜,出尽平川似到家。万里客愁今日散,马前初见米囊花。”这里的“米囊”是罂粟的别称。

罂粟在传入中国的最初数百年里,并没有造成大的危害。这是因为当初很少有人吸食,罂粟主要作为观赏花卉和药用植物。

进入宋代后,罂粟花又称“鼓子花”,被用作妓女的别称。原来宋人尚淡雅而不喜浓艳,故将艳丽的罂粟花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。这时中国人对罂粟的认识更加深入,其种植也日益普遍。

宋代的医家已用它来治病消灾。在杨士瀛的《直指方》、王璆的《百一选

方》、王硕的《易简方》、林洪的《山家清供》等医书里,均以罂粟的壳蒴为治病妙剂。著名词人辛弃疾曾患有重疾,后遇一异僧,以陈年罂粟加人参等制成败毒散,服下丸十余粒,此后即愈。

金元医家承宋朝传统,已普遍用罂粟主治咳嗽及泄痢。到元初,忽必烈于1270年设广惠司,专制阿拉伯药剂。1292年,元人又设“回回药物院”,所用之药当然也包括罂粟。

罂粟不仅为医家所重视,还得到了民间百姓的欢迎。人们普遍视罂粟子煮粥为大补之物。刘翰在《开宝本草》中记录了这种习惯:“罂粟子一名米囊子,一名御米,其米主治丹石发动,不下饮食,和竹沥煮作粥,食极美。”将罂粟子称作“御米”,我们可推断它已进入皇宫,另一方面也可见其珍贵。

但宋代人们已认识了罂粟的副作用。《易简方》记载:“粟壳治病如神,但性紧涩,多令呕逆,故人畏而不敢服。”元代名医朱震亨对罂粟认识最深,他指出:“其止病之功虽急,杀人如剑,宜深戒之。”可见元代人对罂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了解。而且我们从“杀人如剑”四字里,可推测那时社会上已有不少因罂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。

尽管宋元时期人们对罂粟的医学功用已相当了解,但那时尚无“鸦片”之称,也还不懂得鸦片的制法。直到明代成化年间,才有了制作鸦片的记载。

封疆大吏王玺在《医林集要》中记载:“罂粟花花卸结壳后三五日,午后于壳上用大针刺开外面青皮十余处,次日早津出,以竹刀刮在瓷器内,阴干,每用小豆大一粒,空心温水化下,忌葱蒜姜水,如热渴以蜜水解之。”这是中国有关鸦片制作的最早记载。王玺曾任甘肃总督达二十余年,他有可能长期与穆斯林接触,了解了阿拉伯的物产、医术、习俗等。

其后有名医李梴的《医学入门》,书中写到:“鸦片一名阿芙蓉,即罂粟花未开时,用针刺十数孔,其津自出,

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,待积取多了,以纸封固,晒二七日,即成鸦片矣,芒急可多用。”可以判断,那时医家已懂得采取罂粟液制鸦片配作药剂了。

阿芙蓉一词是从阿拉伯语 *Afyun* 音译而来的,而鸦片一词的直接来源,则是英语 *Opium*, 其同义词还有鸦片、阿片、阿扁等别称。最常用的是鸦片一词。另外,罂粟还有藕宾和苍玉粟的别称。

明代人对鸦片医学作用的认识,已达到相当的高度。根据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,鸦片可以用来治疗各种泄痢、风瘫、正头风、痰喘、久咳、小儿慢脾风等二十余种病痛。他还记载了鸦片对性功能的作用,称其“能涩丈夫精气”,因此“俗人房中术用之”。

综上,中国人知道罂粟至少已有1300年的历史,懂得罂粟的药用已有900多年的历史,而会制作鸦片也有500余年的历史了。

毒品风靡

元初,蒙古人远征印度。那时印度已盛产鸦片,因此蒙古人得胜而返时,也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——鸦片。一时,“士农工贾无不嗜者”。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流行服食鸦片最早的成文记录。

明代时,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乳浆取鸦片,但主要来源仍采自国外。当时的东南亚一带,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导,多种植罂粟。《明会典》载:暹罗(泰国)、爪哇、榜葛赖(马六甲)等地多产乌香,即鸦片。他们时常将乌香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皇帝。据史书记载,暹罗国曾进贡给中国皇帝200斤乌香,皇后100斤。直到民国时,有些地方仍称鸦片为乌香。

由于进口的“乌香”急剧增加,明神宗万历十七年(1589年),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。在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颁布的《货物抽税现行则例》中规定:每10斤鸦片的税银为1钱7分3厘。随着鸦片输入的增多,民间逐渐出现了吃鸦片者。成化年间,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的记载了。到了

正德年间,在广东、福建沿海,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。

故随着食者人数的增多,鸦片的价格也直线上涨,有时竟至于一两黄金换取一两鸦片。明代后期,不仅民间食用鸦片日众,而且在京城与宫廷也日益盛行。王玉海的《续紺珠集》记载,郑和之徒弟自西洋携回“碗药”,当时权贵多嗜之。这“碗药”,就是鸦片。

鸦片特有的醉生梦死和飘飘欲仙的舒畅感,令朝廷贵族为之倾倒,甚至连皇帝也不能免。明宪宗曾令臣下出钱收买鸦片。而万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个“鸦片皇帝”。他在朝四十八年,竟长年不视朝政。究其原因,乃是“中乌香之毒”。由于长期吸毒,体质变坏,明神宗经常颁谕旨说:“朕自夏感受湿毒,足心疼痛,且不时眩晕,步履艰难。”他的性格也变得残酷暴虐。

再说清代的罂粟种植。由于清中期以后,各地民众已知罂粟果制鸦片之法,因此,为生产鸦片而种植的罂粟,便在各地肆虐开来。

在清代,罂粟主要通过海陆两条途径流入各地。海路由东南亚诸地传至台湾、福建。福建最早种植罂粟的,大约是福宁府的福安县,在嘉庆年间,那里已盛开罂粟花。此后,又由福建传入浙江。浙江的土壤显然比福建更适合罂粟,道光初,浙江各地几乎是遍地罂粟。

陆路由印度经东南亚、缅甸传入云南。较早记载云南种植罂粟的,是乾隆元年(1736年)出版的《云南府志》。云南天热多雨,是栽培罂粟的理想地,因此“滇省沿边夷民向有私种罂粟”。该地出产的云土(又称南土)在土烟中为上品,产量也急剧增加。1839年云贵总督伊里布在一篇奏稿中提到,一次就缉获烟土12000两。

云南罂粟很快传入四川,至迟在道光元年(1821年)时,涪陵一带的农民已弃粮种烟了。所产人称川土。据史料载:“川省五方杂处,间有吸食鸦片烟之人;会理州、平武县一带,毗连番界,尚有种植罂粟花处所。”从此不仅

“川土见盛”,而且四川还成为了罂粟传播的中转站。

罂粟由四川而传入贵州,在道光十一年(1831年)时,贵州“尚无栽种熬烟之事”。但4年后,已有种、吸鸦片和开设烟馆的记载了。到了道光十九年(1839年),已是“遍栽罂粟,熬炼成土”了。

道光年间,罂粟的种植从四川北上而传入甘肃、陕西、山西等地,这样,仅仅一二十年间,这一广泛区域的农民“废田而种罂粟,岁益浸广”。

土烟泛滥的原因,除了民众趋利之外,还有地方官吏的怂恿。在洋烟开始充斥之时,清政府内有人提出以土烟排斥洋烟的主张。道光十四年(1834年),两广总督卢坤指出种烟的理由:“应弛内地栽种罂粟之禁,使吸烟者买食土膏,夷人不能专利,信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”,以土烟之利夺洋烟之利;也有人说:“种植罂粟花,取浆熬烟,其利十倍于种稻”;又有人说:“鸦片之利,数倍于麦,其益农者大矣”;甚至还有人认为:“内地之种越多,夷人之利日减……不禁而绝。”

由于持以土烟抵制洋烟的官员并不在少数,因此,尽管清政府有禁止内地种植罂粟的政策,如较早的道光三年(1823年)吏兵两部奏请酌定失察鸦片条例,要求禁止“私种罂粟煎熬烟膏”。此后,御史郭柏荫奏请严禁栽种罂粟一折称:“广西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省番舶不通之处,皆由内地民田遍栽罂粟,熬炼成土,地利、民生两受其害。必当严申例禁,以除积习。”

但对于清廷三令五申的拔苗禁烟令,不少地方官吏却持面从态度,他们在许多文告中,将鸦片改称罂粟花,将烟膏改称芙蓉膏,以表示有别于外国的鸦片。其结果,在1831年时,罂粟种植扩展到广东、湖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浙江、福建等省,土烟与洋烟并行,加之土烟价廉,因此各地烟毒与日俱增。鸦片的泛滥,最终使中国蒙受耻辱,成为近代“东亚病夫”的象征。